

秦牧

的散文艺术

QIN MU DE
SAN WEN
YI SHU

张振金 著

7.6

1

• 暨南大学出版社 •

秦牧的散文艺术

张振金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广州

秦牧的散文艺术

张振金 著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刷印

印数：1—3000册

ISBN 7—81029—031—2/I·11

定价：3.00元



秦牧与本书作者近影

序

林 非

在我自己踏上散文之路的一生中间，受到秦牧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他于青年时期付梓的散文集《秦牧杂文》，就曾使我感到深深的震惊。他那种善于深入历史襁褓的感知和分析能力，他那种充满了峭拔和凌厉之气的思索本领，他对于黑暗的满腔愤慨，他对于光明的迫切追求，以及他笔下那些闪烁着晶莹光泽的文字，都无不使我击节赞赏。《秦牧杂文》使我又一次领略了散文艺术的魅力，从此之后秦牧这名字就烙印和蕴藏在我的脑海中了，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现他的篇章，总要腾出时间来仔细地阅读一番。

我在60年代读了他的《艺海拾贝》之后，也同样是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启迪。当时已经卷起了“左”倾的思想风暴，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面，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清规戒律愈来愈多，简直是使人觉得无法动弹，然而《艺海拾贝》却与当时的那股潮流大异其趣，主张文学艺术应该丰富多彩和充满情趣，主张通过审美的途径达到博大精深的高尚哲理思想。在当时充斥着枯燥乏味和大喊大叫的文化氛围中，这本书真可以说是吹起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风，我分明从这里感受到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因此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在这同时，我还读到了秦牧不少谈论散文创作的文字，

深感他对于散文这种文学样式的特征与魅力，理解得十分深切透彻。我常常思忖着，在一片单调和浮夸的文化氛围中间，为什么秦牧能够如此从容裕如和举重若轻地阐述散文艺术的真正奥秘呢？我想到了歌德的那句名言，“理论往往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正是因为秦牧深深领会了古今中外全部生动活泼的文学历史（尤其是其中的散文史），从不离开这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根基，并且进一步掌握它内在的规律，所以才能够站在时代的顶端，胸有成竹地俯瞰着当代文学（尤其是散文）究竟应该走向什么样的康庄大道，从而发表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见解。

秦牧这种广阔无垠和达到了自由王国境界的散文见解，在当时那阵封闭和单调的文化氛围中，确实是显得卓然不凡，充满勇气地宣告着这种健康与合理的散文理论必将茁壮地滋长。这种准确地总结了往昔，因而就能够代表新生与未来的散文理论，已经启示了整整一代的广大读者，我自己也正是这样的受惠者。我在日前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曾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您的许多作品，启发着我走上散文之路，并且促使我产生了坚持下去的勇气”，确实是道出了自己内心中深切的感受。

正是由于怀着这种钦佩和感激的情绪，因此当张振金同志从广州来信，嘱咐我替他的《秦牧的散文艺术》撰写序言时，我感到十分踌躇了。从我的感情来说，自然是很乐于从命的，不过当我理智地考虑了一下，就觉得自己虽然是秦牧作品的忠实读者和极大的受益者，却又历来缺少细致的研究，很难提出系统的理论见解，贡献于他的这本论著之前，当即很郑重地回信提议，请他另邀深入研究过秦牧散文的学

者,从事这篇序言的撰写。也许是我早已发表过的文章中,他得知我对秦牧散文那分敬仰的感情,又来信坚持要我撰写。对于这样诚挚的信任之意,我当然不能再推辞了,只好勇敢地接受这个任务,力求在阅读了他的论著之后,多少能够写出一些略有可取的意见来。

于是我翻开了刚收到的《秦牧的散文艺术》清样,一字一句地读下去,竟觉得愈读愈充满了兴趣,居然在将近半日的时间中,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论著。这一方面显示了它所探讨的命题,本来就充满了审美的情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对于秦牧散文的审美评述,同样都是洋溢着艺术与思想的光彩。

这本论著对于秦牧散文内涵的广阔深厚和警策独创,对于秦牧散文表达技巧中“谈天说地”与“潜移默化”的特点,对于秦牧散文语言丰富多姿和变幻莫测的文采,都从理论的高度作出了分析与说明。读完它之后,我觉得确实是能够将自己原来比较粗糙的感受,获得了极大的升华,使自己的这种感受变得更为扎实和深沉了。

振金同志在分析秦牧散文独特的艺术构思时,总结出了不少含着辩证意味的规律,精辟地阐述了它的既“平常”而又“异常”,既“有限”而又“无限”,既“缩短”而又“延长”,以及它的善于从“存在”中作出“发现”,在“矛盾”中进行“组合”等等,确实是抓住了秦牧散文艺术的不少奥秘。振金同志在分析这些艺术技巧的细部时,还掌握了秦牧散文创作的一个根本性的趋势,这就是习惯于进行发散性思维的高超能力,使自己的艺术构思变得异常活泼,从不被某些条条和框框所束缚,因而能够从各种角度进行深

入和渗透，洞察和驾驭繁复的社会人生与灵魂世界。振金同志的这个提醒很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如果能够在这个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说明，对广大读者就会更有启发了，我急切地盼望着他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完成这样的课题。

在谈论散文创作时，不少评论家往往都标出了“意境”的问题。希望散文创作具有意境，这当然是一种合理的要求，但是在海阔天空似的散文领域中间，“意境”并不是衡量它取得艺术成就的唯一标志，如果只以它作为衡量的尺度，显然是会抹煞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的。振金同志在这里有感而发，认为在散文研究中除了“意境”的这个标尺之外，还应该掌握“非意境”的标尺，并且结合秦牧和其他散文大师的篇章，作出了细致的阐述，我认为他的这个主张对于散文研究来说，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建树，相当发人深省，值得引起散文评论家的充分注意。

《秦牧的散文艺术》作为一本学术论著来说，全部章节的设置与安排，都显得相当匀称，而且井然有序，可以引导读者逐步深入地理解秦牧的散文艺术。当然如果能够分析得更为深入和细致一些，并且汰除前后稍有重复的地方，肯定就会显得更为完美了，希望在再版时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部论著中所穿插的作家书简和“访谈录”，既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又可以烘托和证明作者见解的准确与深切，确实是别有一番滋味和情韵，这样就会使广大者读得到更多的收获。此种饶有兴趣的尝试，显出了散文研究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学术讨论趋于多样化的表现。

总之，这是一部研究秦牧散文创作的好书，能够给予读

者不少审美的享受和理论的思索。正因为我自己在阅读之后感到得益甚多，所以要表达对振金同志的感谢之意，并且要向他这种辛勤和智慧的精神劳动致敬。

1990年6月10日于北京紫竹院傍

目 录

序.....林 非

秦牧的创作思想

 附 作家书简.....(1)

秦牧的创作个性.....(26)

构思,独特的艺术思维.....(38)

文体永远是独创的.....(60)

意境与非意境

 附 作家书简.....(77)

现实主义的新探求

 附 作家书简.....(89)

人格的力量.....(107)

世态与心态的真实描画

 附 作家书简.....(115)

秦牧,一棵繁花树.....(125)

情寄大洋两岸.....(134)

海阔天空

——秦牧访谈录.....(141)

附 散文和散文创作.....(154)

独创和作家的使命.....(179)

——跋语

秦牧的创作思想

“他是以打手的姿态进入文坛的”

每个作家都有其独特的创作道路，秦牧也不例外。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艰难困顿的生活环境中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又是在刀火相交的战争年代登上中国的文坛。在整个战争时期，尽管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使他能较为自觉地把命运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40年代之初，他在国统区桂林，当他以杂文为武器，扬善惩恶，抨击时弊的时候，反动派的报纸就曾骂他“不是共产党却偏装作共产党”。作家司马文森后来评论秦牧时也说：“他是以打手的姿态进入文坛的。”这句话说得不一定十分恰切，但多少反映了秦牧在人生观念和文学道路上的若干特色。那么，他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呢？

秦牧生长在一个动荡而缺少温馨的家庭。父亲起先是乡间的一个裁缝，后来积累了一点钱，当了一间米行资本家的代理人。此后飘洋过海，足迹遍及泰国、新加坡、马来半岛、爪哇等地。秦牧在1919年出生于香港，三岁那年，就随父母到了新加坡。秦牧的母亲是婢女出身的，由于从小受了太多的苦难，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肺病，以致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而欲自杀，幸而被家人发现了，把她从绳索中救了出来。但

后来没过多久，才40来岁，就病逝了。她那一生的历史，可以说是下层劳动人民一部苦难的历史。在全家兄弟姐妹之中，秦牧是最顽皮的一个孩子，比如在家里挥舞棍棒的时候，常常把电灯打破，把古董打碎，因此在家里被父亲打得最多，在学校里也挨老师的打。早年，父亲的生意失败、酗酒，母亲的疾病、早逝，再加上秦牧自己的顽皮、捣蛋，都使这个家动荡不安，象一只小船，行驶在惊涛骇浪里。

但是，秦牧喜欢读书。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书籍就开始使他着迷了。无论是《小朋友》、《儿童世界》一类杂志，还是冰心、陈伯吹等作家的书，甚至武侠小说、神仙鬼怪的东西，他都看。这使他小小的年纪，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他又喜欢看马戏，喜欢大自然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这些事物在他幼小而孤寂的心灵里，仿佛投射来一束束明媚欢乐的阳光。1931年，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骚动起来了，父亲的生意更难做了，秦牧也觉得自己成熟了。他卷入了华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之中，手臂上缠起一条黑纱，上面用白粉水写着“毋忘国耻”、“收复失地”的字样，痛念祖国国土的沦落，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童年的这些生活经历，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个人童年时期的某些记忆，对于他以后行为的选择，往往具有某种启示性的影响。怎样在世上消灭卖儿卖女的惨剧呢？怎样使人间再没有人因为贫穷而受尽凌辱的事情呢？怎样使自己对贫穷多难的祖国有所作为呢？这样的问题时时咬噬着秦牧的心灵。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儿童，当然是没法找到答案的。但是，这促使他从这个角度出发，观察和探索事物，长大以后比较自

觉地走上寻找真理的道路。

1932年,秦牧随父亲回到国内。因为父亲的生意完全失败了,秦牧在故乡澄海、香港等地读书时,经历了异常穷困的生活。1937年以后,抗战八年,他辗转流离于曲江、桂林、贵阳、重庆等地,当过抗日剧社社员,当过编辑、教师,失过业,“经常过着战争时期那种危险而又贫困的生活”。1941年6月,他到了桂林。这时日寇侵略步步紧迫,国家危难,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国民党官僚却大搞磨擦,大发横财。秦牧看到这种情景,十分愤慨,深为祖国的前途忧虑。在艺术上又受了鲁迅杂文的影响,便以杂文为武器,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抒发自己心中的积愤。笔锋凌厉,极饶风趣。后来一部分作品就收集在1947年出版的第一部集子《秦牧杂文》里。1944年桂林失陷之后,他和妻子作家吴紫风一起,背着行包,步行千里,夹在滚滚的难民洪流里,茫然奔向贵阳,历尽辛酸,目睹了混乱和悲惨的景象。他说:

“这段时期的经历,使我对国民党的统治完全失望,我不但不愿再在它所属的任何机构工作,并且觉得一定得奋发努力,投身到民主浪潮中去,如非结束这种黑暗统治,国家势将灭亡了。这种觉醒也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道路。”他到达重庆之后,全力参加了民主运动,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文化人士,如林默涵、刘白羽、胡绳、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等,还经常给《新华日报》写稿。他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如果不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还由国民党当政,中国的前途渺茫了。”广州解放前夕,他到了东江游击区。当他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在凝视、激动、狂欢之余,最后在心里形成一句无声的语言:“我们要在这面国旗

下，全力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是发自肺腑之言。

秦牧说自己是在40年代之初才跨入文坛的。虽然在读书时他就开始写一些东西，抗战开始时在曲江担任《中山日报》副刊编辑时，版面缺少什么就写什么，但大抵是些零碎的东西，还不成什么气候。他真正比较严肃地跨上文学道路，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开始写的主要是杂文，所以走上这样一条创作道路，秦牧自己多次说过：“一来是受了鲁迅作品的影响，二来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种种荒唐残暴、卑污龌龊的事，十分不满，想借此抨击时弊，一抒胸中积愤，三来是想取得一点受之无愧的报酬，以减轻生活的困难。”从这里可以看出，秦牧选择自己的创作道路，是既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由作家本人的生活处境和心理素质所决定的。秦牧曾经这样坦诚地解剖过自己：“我的政治觉悟不能说很早就有的。我个人缺点不少，自由散漫、心胸有点狭隘这一类毛病，我都有。但我也有一些儿优点，比较重是非，轻利害，在学习上有相当毅力，这样就使我能够一步步地靠近真理，多少为人民作了一点工作。我认为在是非利害之前以前者为重，能不能不断探索真理，这一点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发展，关系十分重大。”每个作家走向真理和投入革命的道路是不尽相同的。秦牧所走的道路，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关系到国家兴灭、民族存亡的严重时刻，经过几番风雨磨难，经过真切内心感受，终于认准了方向，坚定了人生的信念，发出了战斗的呼号。这是一种出于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政治选择，他的作品的基本面貌，也就必然注重道德意义，注重教化作用，有着强烈的政

治色彩和时代精神。

“用一根思想的线串起生活的珍珠”

每一个作家，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思想认识、美学观念来进行创作的。秦牧是一个政治意识很强的作家，坚持在作品中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宣传真善美，本来是许多作家的共同追求，但论及真善美的具体内容，各个作家就不尽相同了。秦牧认为，“所谓‘真’，就是要阐发生活的本质，要求本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写作，反对弄虚作假，反对粉饰升平，反对掩盖矛盾，反对诤诤骗骗。所谓‘善’，就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反对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所谓‘美’，就是作品要有强烈的艺术特征，通过艺术手段表现生活，看了一般能够给人以艺术的美感。”^①为了创作真善美高度统一的作品，作家必须具有思想、技巧、生活知识的素养，这三者缺一不可；它们水平越高，互相水乳交融，创作的水平就越高。

真善美这个口号，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都有人讲。秦牧从来没有把它们看作是超社会、超时代、超现实的东西。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产生它的土壤的时代。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用时代的先进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观察现实，认识生活，使自己的作品“为共产主义的新生

^①秦牧：《花蜜和蜂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页。

事物鸣锣开道，鞭挞、清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①

在散文创作中，秦牧主张“用一根思想的线去串起生活的珍珠”，^②就是说，以先进的思想贯串于整篇作品。不管是正面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鞭挞反动腐朽事物的，还是剖析事物道理、描绘山川风物、开拓知识领域，给人以美感享受，陶冶人们情操的，都应该这样。材料可以驳杂纷繁，内容可以丰富多彩，但不可以没有一个先进的思想作为它的中心。秦牧这样比喻说：“事物一般都有它的核心。原子有原子核，细胞有细胞核，地球有地核，太阳系的群星有太阳。这个核就是这大大小小事物的重心所在，吸引住它周围物质的中心。一个作品，几十万字也好，几百字也好，也总有它的‘核’，这也就是它的主题，它的思想。思想是主心骨。如果没有这个主心骨，那个作品也就变得松松垮垮不知所云了。思想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象没有灵魂一样。”^③他又指出：“一篇小品也好，一部巨著也好，不管它有多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动人的情节、精彩的笔墨，如果它所表现出来的核心思想不够好以至于很坏的话，这样的作品也就大大失色以至于糟透了。”^④

这里就自然接触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了。对于文学的各种问题，诸如思想与技巧、生活与创作、生活真实与艺

①②秦牧：《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③秦牧：《秦牧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页。

④秦牧：《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术真实、师承与创新，以及各种艺术表现手段，秦牧向来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体验、观察、研究、分析事物”，“自觉地在艺术创造上掌握运用辩证规律”。这是秦牧生活观念和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对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他也是这样。他向来不赞同那些“文艺即政治”，把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起来，成为“简单的政治传声筒”；他甚至在60年代初期，就明确提出反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那种提法，认为“塑造人物是表达这种中心思想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那道理，正象我们反对‘米、麦是人类唯一的食品’的错误提法一样。”^①另一方面，秦牧又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不能不受政治的制约。那种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隔膜人生、淡化思想的论调，那种认为“作品要有思想、有主题，已经过时”的见解，是“全不足取”的。他说：“任何作品都体现一种思想”，尽管它有正确与谬误、强烈与淡薄、一以贯之与自相矛盾之分。“生硬地穿插表现思想的语言，有时是勉强的，令人不易接受的。但是，如果健康的思想通过卓越的艺术手段，溶入作品中，象盐溶解于水一样，有何不可呢？”

秦牧的散文都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就是说，一般都有一种健康的思想蕴含在作品之中，那就是作品的意蕴、题旨或中心思想。但它都是和形象、感情、生活溶在一起的，而且表现在作品里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比较鲜明，有的比较含蓄；有的比较单纯专一，有的比较复杂多样；有的可

^①秦牧：《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